

呈现广东发展历史
解读感恩文化基因

GAN EN GUANGDONG

感恩广东

—记录为广东改革开放30年作出贡献的30个人



主编：官宛莹 吴晓云

珠海出版社

GAN EN GUANGDONG

感恩广东

—记录为广东改革开放30年作出贡献的30个人



主编：官宛莹 吴晓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恩广东：记录为广东改革开放 30 年作出贡献的 30 个人 / 官宛莹，吴晓云主编.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53-0142-7

I. 感… II. ①官… ②吴… III. 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 1978~2008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835 号

感恩广东——记录为广东改革开放 30 年作出贡献的 30 个人

主 编 官宛莹 吴晓云
责任编辑 靳 红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14 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1

印 刷 珠海三木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数：29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142-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习仲勋：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	陈容清	1
任仲夷：敢为天下先的省委书记	袁端端	9
吴南生：广东三特区的总工程师	陈容清	22
张灵汉：为特区争得立法权	陈容清	30
梁广大：经济特区解放思想的先锋	李晓丹	39
何享健：创造中国家电业传奇	李晓丹	51
董明珠：从普通业务员到营销女皇	吴晓云	61
任正非：商业思想家的横空出世	陈容清	69
李东生：踩在对外开放的浪尖	李晓丹	77
李兴浩：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李晓丹	90
梁庆德：睿智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李晓丹	100
马化腾：电脑世界的“QQ之父”	孙晓峰	112
史玉柱：传奇巨人踏上征途	李晓丹 张中定	125
苏志刚：洗脚上田的民营企业家	官宛莹	137
容志仁：广州市第一代个体户	孙晓峰	145
张建好：从“105元村”到“亿元村”	陈容清	153
钟南山：非典战士	袁端端	163
孟维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李晓丹	174

目 录

陈小奇：广东乐坛领军人	官宛莹	185
微音：辛辣文字 微音大义	官宛莹	196
黄伟辉：一个中专生走出的作家路	袁端端	206
丛飞：爱心城市的一枚金质奖章	袁端端	218
吕中校：用一篇文章震撼一座城市	陈容清	229
安子：深圳打工一族的传奇	沈杰雯	234
蛇口勇士：第二次真理问题大讨论	孙晓峰	245
王金云：阳光下，助人重拾人生	孙晓峰	256
胡小燕：燕南飞，抟扶摇而上	孙晓峰	266
郑小琼：左手打工，右手写诗	袁端端	276
见义勇为：英雄儿女 感动广东	官宛莹	284
谢凤运，王文田：大桥倒塌后，他们没有离开	袁端端	293

习仲勋：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此举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给中国最大的“礼物”，那么这个“礼物”是由习仲勋从邓小平手中接过，亲手送给广东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习仲勋就是广东的“邓小平”。

今天，我们也许对这位“广东邓小平”并不熟悉，但翻开广东乃至中国的现代史，没人可以越过这个名字去看这段历史。他是陕西富平人，但他将最好的光阴给了广东；他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是最早向中央提出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设想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无法向这位被毛主席盛赞“比诸葛亮还厉害”的老前辈汇报广东改革开放的成绩，因为习仲勋同志已经于2002年5月24日离我们而去。此时此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在天堂的某个角落，凝望着广东，关注着这块他热爱的土地。

南下“把守南大门”

197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习仲勋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是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正是广东拨乱反正、由乱到治、由闭塞萧条到奋起腾飞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完成伟大的转折，正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

习远平（习仲勋二儿子）说，1978年，姐弟几人中，只有姐姐桥桥（大女儿）陪同父亲南下。齐桥桥回忆说，在父亲复出前，她就陪同母亲为父亲的平反奔走。习仲勋受命南下时，并未要求带任何一个子女。但是，“叶帅、耀邦、王震等领导非常关心父亲，觉得父亲身边应有人照应，一来女儿是信得过的，二来女儿比较细心，因此，就安排我跟随父亲到广东”。

在来广东之前，习仲勋因为所谓的《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从1962年算起，已达16年之久。齐桥桥说，

虽然备受迫害，历经沧桑，中央要父亲复出的消息来得也非常突然，但父亲却表现得相当平静。最大的变化就是家中的访客骤增，“解放的、没解放的、退下的、在职的，很多人在找父亲谈话。印象最深的是余秋里，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等到机会和父亲交谈”。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机抵达广州。第二天，他就出席了广东第四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会。齐桥桥记得，由于离京前说话太多，父亲会上发言时，嗓子还是哑的。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习仲勋去广东工作，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因为他想“补回16年的时光，为群众多做事情”（其妻齐心语）。

平反“李一哲”案件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

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中，习仲勋先行表态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面对偷渡者潸然泪下

习仲勋来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之风迅速刮起，来势猛烈，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以及广州，最严重的县是宝安（现深圳）。偷渡的不光是农民，还有干部、职工，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學生也结伴偷渡。据统计，仅8月份，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0多人，逃出1800多人。

习仲勋和省委对这股势头极为关注，紧急部署进行遏制，到12月份有所平息。但这只是大潮到来之前的预警。1979年春节过后，风潮再起，人数更多，涉面更广，势头更猛。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近3万人。大量人员外逃，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地方基层组织瘫痪，无人种地、无人收割，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医疗站关门。香港的舆论界反应强烈，诬我“政局不稳”、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国际影响很不好。外逃还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偷渡者络绎不绝，收容站人满为患，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

1978年至1979年，全国上下出现了一派经济复苏、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你们！

率先改革丰富广州菜篮子

当时，广东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商品奇缺，向城镇居民发40多种限量供应的票证。据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朱森林的回忆：“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角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习仲勋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1978年12月25日，广州率先在全国同行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这一大胆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政府统一制定农副产品价格的局面。

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杀开血路”

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不久即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委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1979）50号文件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说“当年的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们要杀开一条血路”。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奠基也是由习仲勋亲自主持的。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

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初期，身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表现出可贵的理论和实践勇气，他率先向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起反击。在 1979 年 4 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明确表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希望中央“下放权力”。

在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问题上，习仲勋斩钉截铁地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提出，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意见引起中央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

据其女儿桥桥回忆，习仲勋一次见到一个港商，问道：“你发财了吗？”在内地经过十年“极左”，政策刚刚出现松动的情况下，这位港商搞不清楚这位共产党的高官见面问发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错愕非常，不知如何回答。习仲勋接着说：“你不发财怎么爱国呀！”这一句话让商人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一下子就敢于在内地投资了。

心系特区，晚年长期居住珠海和深圳

习仲勋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20 世纪 80 年代末退出政坛后，他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近年来似乎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建国 50 周年的天安门城楼上，另一次是在深圳特区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

习仲勋晚年长期居住在珠海和深圳，始终关心着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直到因病住院前夕，他还让身边工作人员驱车带他察看特区建设新貌。习仲勋老人虽然离去了，但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政治家。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同志离我们而去，带走了他光辉的背影，但带不走我们对他的怀念。2004年春天，为了纪念习仲勋，歌颂他对广东作出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作出批示，决定组织习仲勋传记（广东部分）编委会。2007年12月20日，广东省委在广州举行《习仲勋主政广东》首发式。该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作序。《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的出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习仲勋同志学习，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推动广东各项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

在深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习仲勋同志、纪念习仲勋同志、学习习仲勋同志，这对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开创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媒体评论】

习仲勋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是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正是广东拨乱反正、由乱到治、由闭塞萧条到奋起腾飞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完成伟大的转折，正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

——《习仲勋主政广东》序

任仲夷： 敢为天下先的省委书记

任仲夷，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 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秦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 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 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 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 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委常委、书记。

1966 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 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 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 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他是广东改革开放先驱，广东思想解放闸门的开启者。他和广东干部、群众突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蜚声海内外。

他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他是勇智双馨的好公仆。

他生性幽默达观，自谓从此“无所畏惧”，他率先引进港澳资金和技术，说广东是“近水楼台”；引进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说我们要学会“长袖善舞”。

他还告诉人们“要自觉地排污，但不要盲目地排外”。

他就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原第一政委任仲夷同志，开创了广东神话般的改革历程。

有为者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任仲夷的一生与广东，与改革结下了难以解开的情缘。

曲折奋斗的革命生涯

任仲夷生来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奋斗的，他的一生充满了革命和抗争，也充满了勇往直前的精神。

任仲夷 1914 年 9 月出生于河北省威县。青年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5 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 2 月加入中国青年团，同年 6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北平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北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鲁西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东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专职政治教员、党总支书记，冀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冀南区党委干部教育处副处长、党校校长、党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冀南五地委、二地委常委兼专员，邢台市委书记、市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大连市副市长、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书记，旅大行署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军分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农村劳动。1972 年 6

月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3月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10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仲夷多次当选中共人大代表。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任仲夷同志在具有革命传统和进步思想的中国大学读书，他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追求真理、敢于探索的品格和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以及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的精神。1935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和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后，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任仲夷同志受中央委派，从工作了26年之久的黑龙江省，调辽宁省委工作。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想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在他主持下，通过深入开展“揭、批、查”，粉碎了“四人帮”在辽宁的帮派体系，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平反了张志新等一批冤假错案。他提倡农民致富，率先提出搞活农贸市场；主张对企业放宽政策，松绑放权；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发展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无所畏惧”闯进广东

改革开放初期，任仲夷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下，大胆探索，积极实践，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广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克